

---

# 道南論衡

## 以宋為度／維度 ——從清代宋學「再現」到漢宋論述\*

葉宇軒\*

### 摘要

清代「漢宋之爭」論戰史上的「宋學」究竟為何物，現有討論往往莫衷一是，部分學者於是以「宋學具有多元涵義」的多元論來處理這個問題，而本文則欲透過宋學論述史的梳理，在宋學種種差異的詮釋之外，嘗試勾勒從整體上定位宋學諸再現的理論格局。

本文簡要梳理了宋學自乾嘉以降的再現史，將關鍵放在江藩如何穩定了漢學與宋學的門戶與漢宋對舉的論述形構，接著討論此形構其後又怎樣在不同的語境中，為各異的目的被挪用、改寫，發揮迥然的功能。本文認為，宋學與漢宋之爭的論述內涵，從來都是在各種權力的角逐中成形，在不同的情境中，發揮著不同的效應。

**關鍵詞：**宋學、再現、漢宋對立、漢宋之爭、漢宋調和

---

\* 本文的完成，首先感謝張素卿老師多次深入的課後討論，以及臺大中文所 2017 秋季「學術研究與寫作進階」所有同學及鄭毓瑜老師的寶貴意見、錢瑋東學長在行文安排與寫作格式上的提醒。另本文曾於「道南論衡——2018 年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兩位匿名審查人、評論人詹宜穎真誠的批判與討論，以及《道南論衡》期刊審查階段兩位匿名審查人深中肯綮的建議，更使這篇論文增色許多。最後，感謝指導老師陳志信教授在修改過程中的細心指點與鼓勵。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 一、前言

本文的起點，在於思索「清代『宋學』為何存在這麼多歧異的詮釋」？回應這個問題，首先要將清代關於「宋學」的種種言說，視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再現，思考此「論述——再現」的效應，問題化其發生與使用。

正如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所言：「不識宋學，即無以識近代」、「不知宋學，則無以平漢宋之是非」，<sup>1</sup>宋學作為清代重要的「漢宋問題」之一端，自有詳加探析的必要。自《四庫全書》纂成以降，經學文獻中出現兩個引人注目的現象，一是「宋學」的使用逐漸頻繁，二是「漢學」與「宋學」這組對舉關係的大量並置，經皮錫瑞（1850—1908）、梁啟超（1873—1929）、余英時等人的申述，<sup>2</sup>「漢宋對立」長久以來成為描述清代學術發展的主要框架。<sup>3</sup>近年關於清代「宋學」的義界，已有相當豐富的討論，<sup>4</sup>但本文感興趣的是，除語義內涵的分析，有沒有可能以其它的取徑探究「宋學」論述，以揭示清代某些重要的知識現象？<sup>5</sup>

許多學者依據文獻，試圖以「理學」、「義理」、「宋儒之學」、「形而上學」、「德性之學」<sup>6</sup>在不同層次上義界「宋學」，在在給了我們宋學「內涵豐富」的印象，這看似深化了宋學的討論，可專注於義界的研究方法，卻不免窄化了宋學研究的潛力。目前既有關於「宋學」的討論，多預設了宋學概念本質的先存，而人們是依據（或不依據）這個實體，去使用（或誤用）這個概念。但這樣的理解，往往

<sup>1</su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1。

<sup>2</sup> 如皮氏《經學歷史》、梁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清代學術概論》、余氏《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等。

<sup>3</sup> 參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張循：〈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頁49-96等。

<sup>4</sup> 其中尤以相對於「漢學／考據學」，定義宋學為「義理學」的看法為多，具代表性者如余英時：「這種漢、宋（即所謂考據與義理）的對峙，自十八世紀中葉以來即已顯然。」見《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年4月），頁89。另如張濤在近著〈論惠士奇之禮學與乾隆初年漢宋學態勢〉中，亦大抵繼承「漢學—故訓」與「宋學—義理」的格局。見張濤：〈論惠士奇之禮學與乾隆初年漢宋學態勢〉，《臺大文史哲學報》預刊文章（2019年5月），頁1-38。相關探討之整理，可參詹宜穎：《陳澧漢宋調和論——經義的追求與回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頁4-7。

<sup>5</sup> 本文使用「知識現象」一詞，有特殊的內涵。與「知識」不同，「知識現象」有別於前者暗示了一種客觀或科學的描述，更關切「知識」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生產，與該知識發揮的效應。

<sup>6</sup> 以宋學為理學者，如黃進興：〈理學、考據學與政治：以《大學》改本的發展為例證〉，見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3月），頁427-428；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臺大出版委員會，1998），頁42。以宋學為德性學者，如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收錄於《歷史與思想》；彭衛民：〈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清代「漢宋之爭」的內在理路〉，《史學匯刊》第25期（2010年6月），頁69-103。更多宋學義界相關文獻梳理，請見張循：〈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

忽略了清人使用「宋學」的脈絡與意圖——事實上，「宋學」的意義範疇，本身就是使用者整體話語策略的一部分。<sup>7</sup>因此，本文試圖將關於「宋學」的言說，視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論述——再現」，後設省思清代「宋學」的發生與效應。我們當意識到，於被論述的對象來說，所有的論述，皆是再現；所有的再現，都牽涉再現者的詮釋；而所有的詮釋，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做出的詮釋——更重要的是，這些詮釋的效應，會反過頭影響其所處的歷史條件。據此，本文試圖釐清的主要問題有二：

一、自第二節至第三節第一小節，從宋學作為一種「論述——再現」的角度，探討「宋學」論述在清代學術史上的意義。

二、自第三節第二小節至第四節，討論宋學與漢宋對立之論述架構，在不同歷史脈絡中的再現，及這些再現產生了什麼效應。同時涉及那些非經學專家的士子們，如何介入此再現的生產。

漢學家凌廷堪（1757—1809）〈好惡說下〉：

其餘學人，但沾沾於漢學、宋學之分，甚至有云「名物則漢學勝，理義則宋學勝」者，寧識宋儒之理義乃禪學乎？<sup>8</sup>

凌氏顯然相當不同意時人分別並對立漢宋學的現象，在他看來，與漢學對立的並非「宋學」而是「禪學」，也就是「漢禪對立」的格局。從他的意見中，我們可以發現，「漢宋對舉」並非一個理所當然、本即如此的結構，而是歷史運動的結果，因此，討論「宋學」與「漢宋問題」時，最重要的問題恐怕是它們的內涵與關係「為何以及如何被這樣陳述」。林保全認為漢學陣營的江藩透過寫作《淵源記》確立了「宋學」，而這有助於「漢學」認同的穩固，<sup>9</sup>言下之意暗示漢學家主動挑起對立，且這一態勢有利於漢學陣營，但本文認為宋學論述成立的效應之一，卻正在於建立並完成漢宋對立的論式，此論式深深影響了漢學的論域，更讓

<sup>7</sup> 崔發展已注意到「宋學」一詞的內涵，往往與使用者的學術位置與說話情境密切相關，以這兩個維度考察，宋學的意義實可極為不同。參崔發展：〈「宋學」在乾嘉漢學話語中的不同意蘊〉，《哲學與文化》第45卷4期（2018年4月），頁131-143。

<sup>8</sup> 〔清〕凌廷堪：〈好惡說下〉，《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卷16，頁144。匿名審查人之一認為，凌氏之言並非漢禪對立，而是「在於批評宋學落入禪學，乃明清時期極為常見的意見。」但此與本段所論實不相悖。在凌廷堪這裡，起到分別作用的漢宋差異，不是如今常見的所謂「故訓—義理」的（學術）路線之爭，而是「儒禪之際」的判教，在他眼中，「宋學」不是「義理學」，而是充滿「禪學」色彩的可疑對象。這正說明了「宋學」所指的彈性以及（被）論述策略性。

<sup>9</sup> 林保全：《「漢學」之形成與「宋學」之重構：南宋以降至清乾嘉之際學術史著作流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5月），頁220。

反對者得以解消漢學對既有學術論述的批判——本文欲透過以宋為「度」的起點，從宋學的「維度」，延伸楊念群對清代士林經學與帝王經學的討論，<sup>10</sup>在更大尺度的歷史時空中，指出宋學的再現，實是多方角力的複雜場域。

在此先提出兩點說明，首先，本文聚焦討論清代，尤其是「乾嘉以降」宋學的「論述——再現」，並非意在主張「宋學」一詞此前並不存在，或者沒有儒者嘗試建立任何以「宋學」為名的學術系譜。對於概念本體與線性歷史的過度強調，往往忽略了它在各種再現脈絡下的同名異實、不同目的，是以本文不擬以許多概念史研究常見的、以關鍵詞為核心的系譜建構（主要是上溯）工作劃定研究域，期能更加明晰扼要地申述相關問題。

其次，本研究的討論並不以宋學「本質」的先在為前提，而是企圖透過「論述——再現」的觀點，聚焦於乾嘉以降宋學的再現——包含清代宋學論述的歷史、清儒使用宋學各種脈絡、其策略與目的等，進一步檢視清代宋學與據之成立的漢宋對舉論述所揭示的知識現象。

本文關切「宋學」議題的進路，並不透過預設「宋學」概念的明確先在，進而追索其本體，或者用以檢視清人與今人「宋學」用法的正確與否。本文真正感興趣的，毋寧是「宋學」在清代為何以及如何被再現與使用，又怎樣發酵／發效。

## 二、重審「宋學」：宋學研究方法與可能意義

### （一）「宋學」研究的另一進路：「論述——再現」的觀點

相對於清代漢學，以清代宋學為主題的研究目前並不多見，且主要集中於義界的討論，然而，本文以為相關思考至少應存在兩種進路：

其一，將宋學視為穩定連續的概念實體，專注於內涵的釐清。許多先行研究將「宋學」聯繫宋代種種學術表現（如強調實踐的知識論、理學思潮影響下的認識論轉向等）的努力，即是這個進路的代表性成果。

然而，這樣的進路往往傾向本質化、固定化概念，而忽略了話語的策略性。事實上，已有許多討論注意到「宋學」的複雜，我們因此會發現雖有學者以宋學為理學，<sup>11</sup>亦有學者大力反對將宋學等同於理學，<sup>12</sup>至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雖以「宋」為名，但全面性地考察「宋學」在清代的使用，其內涵並不同「宋儒」、「理學」，或更簡單的等同「義理」，甚至和「宋人之學」都未必有直接

<sup>10</sup>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7月），頁396。

<sup>11</sup> 參註4。

<sup>12</sup> 如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24；張循：〈清代漢、宋學關係研究中若干問題的反思〉，《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7年），頁43-53；張循：〈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等。

的關係。<sup>13</sup>清人的「宋學」再現涵義多重複雜，舉例而言，周廣業（1730—1798）〈諸經古注疏〉謂：

元明以來，習科舉者墨守宋元儒注，是以一家之言包括數聖人之微言大義，本屬未盡，明中葉後漸悟其非，於是有稱述古注而疑宋人為杜撰者，本朝名儒碩學尤銳意於漢魏晉人之學，而宋學僅以供場屋之用而已。<sup>14</sup>

永瑤等〈《古經解鈎沉》三十卷（江蘇巡撫采進本）〉：

自宋學大行，唐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掣擊，其書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蕩軼於規矩之外。<sup>15</sup>

陳壽祺（1771—1834）〈孟氏八錄跋〉：

善乎執事之言曰：「文藻日興，而經術日淺。才華益茂，而氣節益衰。固倡率者稀，亦由所處，日蹙無以安其身，此人心世道之憂也。愚謂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中之學不講，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過也。故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而況所謂漢學者如同畫餅乎？」<sup>16</sup>

謝章铤（1820—1903）〈書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後〉：

國朝講考據與漢人近，至性理之學，則自安溪、江陰、當湖、睢州數鉅公外，後起寥寥，顧余竊謂立品端方、踐履篤實即是宋學。<sup>17</sup>

<sup>13</sup> 本文意不在處理宋學的義界，相關討論難免單薄，但「宋學」與宋代學術史的關係，註3張文在〈「進德」與「義理」：兩種不同於理學的宋學〉一節中，有相當精彩、考證嚴實的討論，指出清代「宋學」不必與「宋代、宋儒之理學」相關，惟望讀者參看，以補充本文未盡之處。結合張文此一觀點，更顯以「論述一再現」觀點討論宋學問題之迫切。

<sup>14</sup> 〔清〕周廣業：〈諸經古注疏〉，《過夏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北京圖書館藏清種松書塾抄本影印，冊1154），卷2，頁225。

<sup>15</sup> 〔清〕永瑤等：《古經解鈎沉》·三十卷（江蘇巡撫采進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卷33，頁696。

<sup>16</sup> 〔清〕陳壽祺：〈孟氏八錄跋〉。

<sup>17</sup> 〔清〕謝章铤：〈書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後〉，《賭棋山莊所著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影印，冊1545），文集卷4，頁304上。

周氏所謂宋學，為理學官學化後學子所困守的宋元儒注，並涉及明中葉以降對於宋人疑經改經之舉的反省，稱清後宋學唯科舉之用；四庫館臣所謂宋學，為宋代重注經典、疏於保存故訓的風氣，並指其導致了「憑臆空談，或蕩軼於規矩之外」的心性學；陳壽祺此段引段玉裁對宋學的描述，並不是指程朱、張載等人的理學，而是一種「聖賢修身立行之學」；至於謝氏，則將宋學釋為「德行之學」，且特以「竊謂」區分「宋學」與「性理之學」的不同側重。<sup>18</sup>

同時，其他清代學者對「宋學」與「漢宋分／對立」也有不同的看法。戴震（1724—1777）〈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sup>19</sup>

正如前引凌廷堪〈好惡說下〉所言，漢宋對立既非本然，那麼，本文認為「宋學」與「漢宋問題」的內涵與關係「為何以及如何被這樣陳述」、這樣的再現又產生了什麼效應等問題，在相關討論中實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據此，本文擬採取另一個研究「宋學」的進路：

將有關「宋學」的言說加以歷史化，即「論述——再現」化。我們的焦點將不在於「什麼是宋學」，而是讓宋學的知識及其討論熱潮成為可能的條件與情境是什麼？論述宋學的相關方式是什麼？這些論述經歷什麼轉變、發生過哪些效應？

同時，「論述——再現」的認識方法，對「宋學」研究的重要意義，更在於發掘宋學論述對漢學論述的影響。

## （二）「宋學」論述下的「漢學」論述<sup>20</sup>

惠棟（1697—1758）這封自陳家學淵源與基本學術觀點（以《易》學為代表）

<sup>18</sup> 謝章铤此言，當置於清代理學理論發展的積弱下理解。相較於漢學名家輩出、累代進展，性理之學確是「後起寥寥」，學者多不能成家。更深的原因，又或是一方面在科舉以朱學為定本的前提下，也沒有進一步發展理論的動力，且清代的思想控制嚴密，學者往往也缺乏申抒己見的空間。如此困局中，「顧余竊謂立品端方、踐履篤實即是宋學。」的轉化，自有不得不的理由。

<sup>19</sup> 〔清〕戴震著，湯志鈞點校：《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214。

<sup>20</sup> 蒙張素卿老師指教，以為考量清代漢學蓬勃發展的背景，本小節以「『漢學』論述下的『宋學』」為名應更妥切，在此稍作解釋。之所以如此命名，正有意反思漢學在清代經學研究中的首要地位。清代漢學聲勢大、發展早乃學界共識，宋學往往也因此被擺在次要、被動或參照的地位，但本小節正企圖指出宋學論述長期被忽略的、對漢學論述的影響力，以期顯化宋學論述在清代經學研究中的可能意義。另外，本文以宋學為「論述——再現」，同時大量談及「漢宋對立」的問題，或將使讀者誤以為相對於宋學，「漢學」則是清楚的概念實體，可正如前言所述，所有的言說都是再現，所有的再現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詮釋，如此自然也應該從「論述——再現」角度理解漢學。

的書信，是討論清代「漢學」肇端最重要的文獻之一：

棟少承家學，九經注疏，麤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樸庵公以古義訓子弟，至棟四世，咸通漢學，以漢猶近古，去聖未遠故也。《詩》、《禮》，毛、鄭；《公羊》何休，傳注具存；《尚書》、《左傳》，僞孔氏全采馬、王；杜元凱根本賈、服，唯《周易》一經，漢學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資州李氏《易解》，反覆研求，恍然悟潔靜精微之旨，子游《禮運》、子思《中庸》，純是易理，乃知師法家傳，淵源有自。<sup>21</sup>

此處「漢學」為含括「漢代經說」、「家法、師法」的系譜觀念以及方法論在內的術語。我們可與其後學黃承吉（1771—1842）對「漢學」的描述比較：

按「漢學」二字，至國朝而始見……乃與「宋學」相形而後出也。<sup>22</sup>

在該文中，黃承吉謂「漢學即是經學，經尊所以學尊，經學載於文字，字明然後經明。」這個著眼點與惠棟的立論基本一致，都是以溯源為核心概念進行術語義界，<sup>23</sup>我們因此注意到兩文最大的差異，正是在黃承吉筆下，「漢宋對舉」的論述形構清楚出現，他特別彰顯「漢學」乃與宋學「相形」而出，這個發生學上的描述，值得我們細細體會。進一步討論這個轉變，必須談到嘉慶年間江藩（1761—1831）的《國朝宋學淵源記》。<sup>24</sup>

江藩首先寫成《國朝漢學師承記》（下稱《師承記》），其後數年，又再出版了《國朝宋學淵源記》（下稱《淵源記》）。考諸文獻，「宋學」一詞在清代的廣泛出現，以及宋學對舉於漢學這個論述形構的成熟，當以江藩二書，尤其後者的出版，為里程碑。藉《師承記》與《淵源記》揭示的系譜，「漢宋對舉」這個論法更加「言而有據」，並透過論述的不斷再生產，反覆肯認並加深雙方的分歧。以「中國基本古籍庫」為檢索範圍，綜觀有清一代，在《淵源記》之前，談及「宋

<sup>21</sup> [清]惠棟：〈上制軍尹元長先生書〉，《松崖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光緒劉氏刻聚學軒叢書本影印，冊1427），卷1，頁275上。

<sup>22</sup> [清]黃承吉：〈字詁義府合按後序〉，《字詁義府合按》（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271。

<sup>23</sup> 在〈九經古義述首〉中，惠棟認為：「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黃論顯然與此一脈相承。（〈九經古義述首〉，《松崖文鈔》卷1，頁269上）

<sup>24</sup> 張循在〈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中提及「……『漢學』與『宋學』，至此已然深入人心。而由此層面引起的『漢宋之爭』，也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頁66），然究竟至「此」是何時？本文以江書的出版為關鍵。



學」的文獻凡二十條，<sup>25</sup>其中相當比例是「宋代之學」（未對舉於漢學，多明確指朱子學）的簡稱，而在《淵源記》之後，談及「宋學」的文獻高達五十多條，最重要的是，其中「純論宋學而不與漢學相對而言者」幾希，<sup>26</sup>也就是說，《師承記》與《淵源記》出後，「宋學」的討論熱度不但顯著提高，更深深地嵌入了「漢宋對立」的論述形構之中。<sup>27</sup>

這當然不全是江藩一人的「功勞」。早在袁枚（1716—1797）的認識中，<sup>28</sup>我們就己能看見「漢宋對立」的苗頭，但正如曹美秀所言，江藩「被指為激起漢、宋強烈對峙的首要人物。」，<sup>29</sup>朱維錚也認為「在江藩以前，清人雖己在注意經學的傳授史，但還沒有像江藩這樣從嚴分漢宋、擯斥今文的角度，陳述經古文學的傳授史。」<sup>30</sup>這樣的評價當然攸關論者採取的視角，但江氏早歲知名，時為公認的惠棟傳人、四部兼通的經學大家，在《師承記》刊印一年前（1817年），<sup>31</sup>龔自珍（1792—1841）在與江氏的書信中提到「漢學」一詞的「十不安」，<sup>32</sup>便己透露他對此書出版效應之廣泛的預期，而在《師承記》與《淵源記》刊行數年後，方東樹（1772—1851）更寫下《漢學商兌》回應江氏的漢宋觀，可合理推測江書在當時應受到相當矚目。因此，在正式揭櫫「漢宋對立」的認識框架，並使相關討論白熱化等方面，江書確有其值得重視的意義。必須特別注意的是，經由江藩確立的「漢宋對立」，是一種論述形式，而非論述內容，深入討論詳第三節第二小節。

<sup>25</sup> 同一時期，經惠棟提倡、樹立門徑，「漢學」一詞己被廣泛而大量地使用。當然，彼時關於「宋代之學」的討論是非常多的，可「宋代之學」並不能與「宋學」等量齊觀。

<sup>26</sup> 如顧廣圻〈壞室讀書圖序〉：「是故漢人未嘗無俗學，宋人未嘗無漢學也。」（《思適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徐渭仁刻本影印，冊1491），卷13，頁105上）、陳壽祺：「故專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孟氏八錄跋》，《左海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冊1496），卷7，頁297下）、方東樹：「欲糾宋學興漢學。」（《漢學商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刻本影印），卷中之上）等等，事實上，即便在行文中沒有提及「漢學」，論者說明宋學的方式——義理的、心性的、踐履的——也都指向一個隱然在場的「他者」：漢學。

<sup>27</sup> 《淵源記》約成於道光二年（1822年），本文首先考察相關文獻的刊行日期，若未見刊行日期，則以學者本人或交遊對象之生卒年推斷，並輔以文獻性質（如是否為日記），判別該資料出於《淵源記》之前或後。另清代提及宋學之文獻自不只七十條，本文僅以「中國基本古籍庫」為範圍檢索，並刪去不同文集重複收錄，或同篇文獻反覆提及同一關鍵字的情況，才得出此並不準確，但仍具概觀意義的統計數據。

<sup>28</sup> 袁枚〈答惠定宇書〉：「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袁枚著、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冊2，頁305-306）

<sup>29</sup> 參氏著：〈晚清漢、宋學視野中的朱子——以陳澧與朱次琦為例〉，《成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10年12月），頁165。

<sup>30</sup> [清]江藩著，徐洪興編校：《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7月），頁11。

<sup>31</sup> 本書刊行年分引自漆永祥的考訂，參氏著《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43-249。

<sup>32</sup> 龔自珍：〈與江子屏箋〉，《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47。

焦點回到前引惠氏與黃氏之論。經過以上回顧，我們當可以發覺兩個重要的現象：首先，漢學曾經可以不對舉於「宋學」，換句話說，他們未必要是彼此的映象，在概念發生的時刻，他們或不是同一個義類／層次上對等的主體；其次，在江藩確立了漢宋對舉的框架以後，這組論述中雙方的意涵與效應，也發生了微妙的改變。我們不難發現，惠棟與黃承吉關切「漢學」的重點已有所不同，黃承吉所謂「相形而後出」，意即在發生學的角度上，若沒有宋學，則不能有漢學。

「漢學」與「宋學」的相關概念，早各自在惠棟與毛奇齡那裡就已經發生、流佈，可直到江藩以《師承記》與《淵源記》標明漢宋學的系譜與二者對舉的規模，「漢學」與「宋學」的關係才被廣泛討論。「漢宋分別（但未必對立）」的論述雛形，固然在江藩之前就已出現，<sup>33</sup>但直到《師承記》與《淵源記》在嘉慶年間刊行，才以系譜的建構，確立了宋學並進一步強化了漢宋「對立」的形構，而這組原本被「發明」來「納宋入漢」的論述裝置，在其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卻被挪用做證成並強化漢學「重訓詁而輕義理」、宋學「輕訓詁而重義理」等二元印象。「宋學」的廣泛使用，很大程度正是被用來完成這些對立的想像。相關問題將在第四節處理。

### 三、「宋學」論述簡史與其思想意義

隨著清初對心性義理之學的批判，已偶見「宋學」的使用。其中以毛奇齡最具代表性，舉凡《春秋毛氏傳》、《王文成傳本》、《四書改錯》、《易韻》、《詩傳詩說駁義》及學術散論中，皆可見「宋學」的蹤跡，但此時使用頻率仍不高，相關討論比較零碎，涵義基本等同朱子學，與乾嘉學者的語境頗有落差，可視為「前宋學時期」；爾後「漢學」聲勢逐漸壯大，乾嘉年間，「宋學」的論述與「漢宋之爭」的討論也逐漸受到關注，在《四庫全書·經部總敘》中，四庫館臣便已提出「學分漢、宋」的見解，又以江藩二書的刊行為標誌，確立了「漢學」、「宋學」與「漢宋分立」的格局，此一論題正式浮上檯面，引發相當迴響，進入宋學論述「發展期」；而透過江氏《師承記》、《淵源記》的劃分，穩固的「漢宋對立」論述形構，於清中葉後不斷再生產，衍伸出各種對立的概念組。我們當特別注意此時「漢宋對立」與其派生的二元論述，大量為反對者所用，批評漢學「不思義理

<sup>33</sup> 漆永祥認為「漢宋對立」意識始於惠棟，此論有待商榷。按惠棟在《九曜齋筆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民 59，聚學軒叢書據清光緒中貴池劉氏刊本影印）卷二〈本朝經學〉中確曾以「漢」、「宋」分判治《易》諸儒，並以毛奇齡等人為「非漢非宋，皆思而不學者」，但彼漢宋二者，實乃「分立」而非「對立」的學術典範，並參同書他處評價漢宋的條目，其所謂「宋」往往只是（以朱熹為首的）宋儒、理學甚或朱熹本人（如同卷〈漢宋〉條：「漢人經術，宋人理學，兼之者乃為大儒。」），而非「宋學」這樣往往被定義以「義理」或「實踐」的整體概念。後雖有四庫館臣、姚鼐等人論及漢宋問題，但討論規模未及江書刊行後引起的盛況，概念亦仍抽象（如以源流、治學特徵論之），直到江藩以學術系譜構築，將漢學與宋學具體對應本朝諸儒，宋學本身以及漢宋對舉的認識，才被明確提出與廣泛議論。見氏著：《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頁 250。

而專務訓詁」、「空談訓詁而少踐履實用」，力駁危及官學權威的漢學風氣；主「調和」之論的學者，也出於不同的考量和時代條件挪用、改寫這套話語。

「宋學」由「朱子學」、「宋儒之學」，轉化為「漢宋對立」中的「宋學」之過程，江藩《師承記》與《淵源記》的刊行，實為關鍵。

#### （一）《國朝漢學師承記》與《國朝宋學淵源記》的成書背景<sup>34</sup>

漆永祥歸江藩的《師承記》與《淵源記》入秦漢以降的學術傳記史籍叢書，認為江藩分立漢學與宋學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回應國史是否應在《儒林傳》外別立《道學傳》、漢學家是否得入《儒林傳》之爭論，另一方面，也有意為當時發展已相當蓬勃的漢學做一小結。<sup>35</sup>而本文認為，江藩也欲以二書的著作，緩和當時逐漸高漲的漢宋對立風氣，卻造成了值得注意的反效果。

康熙年間，朝廷徵集學者入館修《明史》，當時曾為《道學傳》保留與否的問題，朝野爭論。宋史別立《道學傳》，並以之尊於《儒林》，自然象徵了元代官方學術立場的選擇，同樣的，《明史》分立二傳與否的問題，也絕不只是修史技術的討論，更涉及複雜的政治角力。眾所皆知，由宋至清，科舉官學一應為朱子學，未曾動搖，<sup>36</sup>想當然耳，多數士子所習亦然，是以館臣如彭孫遹（1631—1700）、徐乾學（1631—1694）、萬斯同（1638—1702）等人皆主沿用《宋史》制，外王陽明（1472—1529）、劉宗周（1578—1645）等人於《道學傳》，後黃宗羲（1610—1695）上書朝廷，謂正史唯《宋史》於《儒林傳》外別立《道學傳》，乃「錯亂乖謬，無所折衷。」<sup>37</sup>以其朝野影響力，《明史》遂恢復正史只立《儒林》、《文苑》的傳統。

到江藩時，《明史》雖已修定刊行，然本朝《儒林傳》究竟該怎麼編纂，仍以不同形式延續康熙年間的《道學》與《儒林》之爭。如翁方綱便認為：「今日《儒林》之目，必以程朱為定矩也。」<sup>38</sup>亦批評江聲（1721—1799）《尚書集注音疏》「自注自疏」，不守程朱經說，以此為度，一眾以撰立新疏為志業的漢學家，自然都沒有資格廁身《儒林傳》了。

<sup>34</sup> 本小節寫作受惠於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第八章第一節〈《漢學師承記》編纂之學術背景〉甚多，特此致謝。

<sup>35</sup> 同前註，第八章。

<sup>36</sup> 或有學者以為乾嘉時朝廷開始接受漢學，並重用漢學家如惠棟、戴震、錢大昕等人，按此說未切。惠棟雖聲名遠播，曾得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然終生未仕；戴震六次會試未中，晚年乃以其學術成就為乾隆帝特招人館修《四庫全書》，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其中唯錢大昕少有令譽，官至四品而已。包含江藩在內，乃至於章學誠等人，清代專研漢學者仕途皆難謂亨通，若非屢試不第，便是盛年掛冠，著書林下，乃至於生活無著，衣食困頓，如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若我朝諸儒之為漢學也，則違忤時好，見棄眾議，學校不以是為講，科第不以是為取。」參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1026-1028。

<sup>37</sup> [清]黃宗羲：〈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5月），頁450。

<sup>38</sup> [清]翁方綱：〈與曹中堂論儒林傳目書〉，《復初齋文集》，卷11，頁444下。

同時亦有學者思考緩和乃至調和之道，如焦循（1763—1820）便以所治者為「經學」否，做為入《儒林》的判準；<sup>39</sup>張鑑（1768—1850）則主張義理、考據、名物兼顧，「奚必拘牽於『心性』兩字？」；<sup>40</sup>而清代著名經學家、與朝廷關係密切的阮元（1764—1849）更表示：「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諍也。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sup>41</sup>以為周公制禮，本分師、儒，前者以德行、後者以六藝教民，漢學與宋學各得一端，不可偏譏互諍，是當同入一傳。正是在這些圍繞著官修《儒林傳》的議論中，江藩寫下了《國朝漢學師承記》與《國朝宋學淵源記》。<sup>42</sup>

除了上述關於官修學術史籍的討論頗輕視漢學家外，縱是漢學風氣漸盛，民間私撰的清代學術史著作，仍多以宋明理學為宗，罕見討論「漢學」發展，加上此時對「漢宋問題」的爭論空前，身為惠棟再傳弟子，江藩自有必要針對漢學百餘年的演化，做一番小結與檢討，並處理日漸熾盛的「漢宋問題」。

## （二）漢宋對舉形構的確立與江藩對漢宋問題的回應

前節已經提到，江藩在漢宋論爭史上的關鍵地位，在於漢宋對立論的確立，但須特別留意的是，江藩對這個問題最主要的影響是「形式」上的，他固然提出了自己的漢宋學定義，但更重要的是創造了使它們緊緊相依、互相依存的論述形構。透過歷史性的「漢宋對立」之內涵比較，這點就顯得格外清楚。我們會發現，在江藩之後，這個論式雙方承載的意義其實不斷改變，不為江藩的「本意」所限制。

以「訓詁 v.s. 義理」這組最通行的詮釋為例，在江藩，漢宋對舉並不是這樣被理解的，最明顯的證據是，一旦我們以此檢視兩書的作者自述與列敘譜系，便會一再碰上難解的困境。<sup>43</sup>以下從兩書自序和內容的偏重上，試析江藩的漢學與宋學概念。首先看《師承記》的部分：

<sup>39</sup> [清]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雕菰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四年院福嶺南節署刻本影印，冊1489），卷12，頁225-228。

<sup>40</sup> [清]張鑑：〈再答阮侍郎師書〉，《冬青館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四年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影印，冊1492），卷5，頁56下。

<sup>41</sup> [清]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擘經室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5月），卷2，頁26。

<sup>42</sup> 蒙審查人指正，在《明史》與本朝《儒林傳》編纂過程中，面臨的主要是心／理之爭，但本文認為，無論是儒林一道學、心學—理學乃至漢學—宋學的競合，其實都圍繞著「正統」問題一脈相承地展開，江藩雖置身於清中葉的漢宋爭議之間，但他要面對的正好是，或說依舊是清初以降「異端」企圖「正統化」的嘗試—無論表現為漢宋之爭或漢學能否被科舉接受—因此聯繫上《明史》乃至國史修纂的脈絡思考《師承記》與《淵源記》之成書，也是相當重要的。

<sup>43</sup> 當然，系譜如何構造、為何構造，也有其政治處境的考量，而不純是「學術」問題。

先王經國之制……所以耕夫餘子亦得秉耒橫經，漸《詩》《書》之化，被教養之澤……三代之隆軌也。秦並天下……聖人之道墜矣。然士隱山澤岩壁之間者，抱遺經，傳口說，不絕於世。漢興……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六經》《五典》各信師承，嗣守章句，期乎勿失……故老以為前修，後生未之敢異……唐太宗挺生於干戈之世……頒示天下，命諸儒草章句、為義疏。惜乎……《易》用輔嗣而廢康成，《書》去馬鄭而信偽孔，《穀梁》退麋氏而進范寧，《論語》則專主平叔，棄尊彝而寶康瓠，舍珠玉而收瓦礫……宋初承唐之弊，而邪說詭言，亂經非聖，殆有甚焉……至於濂、洛、關、閩之學，不究禮樂之源，獨標性命之旨，義疏諸書，束置高閣，視如糟粕，棄等弁髦，蓋率履則有餘，考鏡則不足也。<sup>44</sup>

在江藩眼中，經書章句直通形而下的治及形而上的道，嗣守章句、熟稔名物，乃是為了不失先聖治道。他評判漢代學術之優於宋代學術的原因，不僅在於漢人與經典（及其註解）之寫定，在時間上與三代無可爭議的親近性，更是漢人謹守家法師說的治經特點，而從來無關訓詁考證與性命義理的高下。可以說，江藩從來就沒有外義理、踐行於漢代之學。這個分殊的析出，第一次發生在他討論宋代學術的時候，當時「邪說詭言，亂經非聖」且「義疏諸書，束置高閣」，在經典之學上，直是一無可取了，但宋學至少還得其一端，所謂「率履則有餘」也。

至於《淵源記》一書，在構建宋學發展史的同時，江氏欲收編其於漢學麾下的企圖，可以說是昭然若揭：

爰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先儒之義疏也，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苟非漢儒傳經，則聖經賢傳久墜於地，宋儒何能高談性命耶……朱子服膺鄭君（鄭玄）如此，而小生豎儒妄肆詆訶……然而為宋學者不第攻漢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為朱子之學者，攻陸子；為陸子之學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學興，尊陸卑朱，天下士翕然從風，姚江……亦自悔其黨同伐異矣。竊謂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內也；陸子主靜，大學定而後能靜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節雖異，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也……惟願學者求其放心，反躬律己，庶幾可與為善矣。至於孰異孰同，概置之弗議弗論焉。<sup>45</sup>

江氏對宋學史的處理，巧妙運用了三段時間敘事。首先是朱子的發源時代，

<sup>44</sup> [清]江藩著，徐洪興編校：《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 5-6。

<sup>45</sup> [清]江藩著，徐洪興編校：《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 186-187。

以道統系譜論則遠繼漢儒，其學尚醇，尊服鄭玄；其次是朱王後學流弊時代，建立在對於「為宋學者」的兩點批評上：好為新說、黨同伐異；最後，以他本人的「期許」為象徵，當下則屬漢宋二學求同存異的精純復興期。<sup>46</sup>也就是說，光是在江藩自己的筆下，宋學就有三種不同面貌，固然「其本則同，要皆聖人之徒」，但各自治學的特徵與獲得的評價，也有微妙的變化。

而就二書內容言，可以發現《師承記》各傳大量載錄學者師承、著作及學術影響，《淵源記》則基本未見學者著作的相關記載，<sup>47</sup>而專注於學者德行之過人、讀書之用力，乃至對鄉里風俗的醇化等方面。正如《淵源記》卷上：

近世漢學昌明，遍於寰宇，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為漢學者始於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藩為是《記》，實本師說。<sup>48</sup>

江藩透過系譜的追溯，確立了「漢學」與「宋學」的實在與界域，以「經術」為漢學與宋學的關鍵差異（但這並不表示宋學外於漢學，而是以宋學為漢學之一端的发展），反對不本於漢儒傳注解經者（即宋儒經說）；以「立身」為宋學，強調其作為處世模範，仍可資借鑒。若據此稱江藩意圖「調和」雙方，或許還有爭議，但要說江藩旨在抑宋揚漢，恐怕更有待商榷。<sup>49</sup>江藩並非全盤否定宋學，而是以納宋入漢之舉，使宋之「行」得以增色漢之「學」，其緩和漢宋之爭的企圖，自不待言。<sup>50</sup>

<sup>46</sup> 一方面顯示江藩仍不欲激化對立，二方面恐也出於理學仍為官學之故。類似的敘事方式也出現在長白達三為此書作的〈序〉中：「自宋儒道統之說起，謂二程心傳直接鄒魯，從此心性、事功分為二道，儒林、道學判為兩途；而漢儒之傳經，唐儒之衛道，均不啻糟粕視之矣。殊不思洛、閩心學源本六經，若非漢唐諸儒授受相傳，宋儒亦何由而心悟！」（〔清〕江藩著，徐洪興編校：《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184）。

<sup>47</sup>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治宋學者，江藩雖未著墨其師承，卻以南北經緯，分為上下二卷，其中直指桐城派的言外之意，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朱維錚對此的分析見《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15-17。

<sup>48</sup> 〔清〕江藩著，徐洪興編校：《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187。

<sup>49</sup> 林保全在其博士論文《「漢學」之形成與「宋學」之重構：南宋以降至清乾嘉之際學術史著作流變》中，認為江藩暗示宋學乃「有行無學」，不如「有行有學」的漢學，意在揚漢抑宋，本文以為不無過度推論之虞。參氏著《「漢學」之形成與「宋學」之重構：南宋以降至清乾嘉之際學術史著作流變》第五章第二節。

<sup>50</sup> 持類似看法者，遠有錢穆謂二書：「不於漢、宋分軒輊」，近如陳摯在學位論文中論證《淵源記》的「崇漢而不詆宋」。參錢穆：〈清儒學案·序〉，《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22冊，頁613；陳摯：《漢學家眼中的宋學——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述論》（湖北：湖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另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納宋入漢」以調和漢宋的方法，跟前述戴震、凌廷堪等人以為訓詁、義理「非為兩途」（皆涵納於漢學中）的觀點，實有深層的聯繫，而與清中葉後部分調和論者發展出的「漢學宋行」，

江藩的論調自有實際考量。一方面他所處的時代，漢宋門戶已日漸激化，確有評價雙方，並在二元對立中尋找出路的需求。另一個更重要的潛在動力，乃在解決漢學與官學主流不一致的問題（與「官學」衝突，並不等於與「官方」衝突，詳本文第四節）。清代科舉定本仍是朱子的《四書集注》，漢學家擺落程朱，高倡以漢儒傳注解經，直接威脅了清代朱子學詮釋系統的權威，<sup>51</sup>彼時江藩對「漢學」與「宋學」的論述，或不妨視為「漢學」與「官學」衝突的象徵性置換，與其說他是在安置漢、宋的理論位置，不如說他試圖藉此回應漢學與官學間存在已久的緊張。

可就江氏二書刊行後的情況來看，此番嘗試恐怕並不成功。江藩未能處理爭論的核心，意識到人們使用「宋學」論述的企圖，僅改變了「漢學」與「宋學」的內容與系譜，卻無力挑戰論述它們的方式。是故其努力不但以失敗告終，甚至反過來肯定並強化了漢宋對立的論述。他為了緩解漢宋之爭寫成《師承記》與《淵源記》，但為二書所確立的兩造系譜，反在後人的挪用下，使「漢學」與「宋學」的壁壘分明成為定論。調停的努力，最終堆成了決裂的柴火。江氏的失敗，也正向我們證明了視宋學與漢學問題為一「知識現象」的重要。

江藩的論述後來被轉為漢學、宋學各執一端的二元論。此後，這組對立關係本身又作為話語原型，派生無數斷然二分的對立論述：訓詁與義理、禮學與理學、考據與立身、窮經與進德、經學與理學、道問學與尊德性……當人們被一再提醒「漢學」與「宋學」之不可共量，自會在此前提下，不斷尋找該對立之實在的證明。檢視無數的同形衍異，我們會發現，「漢學」與「宋學」的內容並沒有一個先在、公認的絕對規定，每一種差異的內涵，都是在對立的公式中，在不同的脈絡裡，被反覆論述成形。江藩作為漢宋學論述史的關鍵人物，最重要的「貢獻」並非概念內容，而是這個論述形構的確立。

誠如《詩經》專家、漢學家胡承珙（1776—1832）所言：

治經之法，義理非訓詁則不明，訓詁非義理則不當，二者實相資而不可偏廢。自有謂漢學詳於訓詁、宋學晰於義理者，遂若判為兩途。<sup>52</sup>

---

一體兩面」之論，存在本質上的差別。另外，本文審查人之一對於「納宋入漢」能否視為「調和漢宋」的方法，又有無貶抑宋學的意圖，頗為保留。但本文認為這是否在貶抑宋學，端看論者站在什麼位置提出。以宋學家自居的方東樹當然會認為這是對宋學的「降格」，但江藩作為漢學家，且是有意勾勒兩漢以降學術演變圖像的學術史作者，「納宋入漢」只怕非但未在「貶抑」宋學，同時更是構設歷史敘事的必要手段。

<sup>51</sup> [清]江藩著，徐洪興編校：《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13。

<sup>52</sup> [清]胡承珙：〈四書管窺序〉，《求是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影印，冊1500），卷4，頁273下。

那麼，我們接下來要問的是，縱然止於概念上的改寫，並不能推翻漢宋對立的論式本身，但假若戴震、凌廷堪、胡承珙等漢學大家早已發出訓詁與義理「非為兩途」的呼聲，試圖透過概念範疇的重新界定，來挑戰漢宋對舉的論式，為什麼這樣的意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不能發揮影響力、得到深化發展的機會，甚至遭到有意忽視？

#### 四、以宋為「度」：「宋學」的歷史化閱讀

##### (一) 以宋為「度」，收編漢學

自江氏二書確立了漢學與宋學的門戶及漢宋分立的論述規模，對立漢學與宋學的認識就更加普遍。正如前節所述，在江氏那裡，漢宋二元論的提出，是為了接合雙方，然而轉眼便被挪用為激化對立的資源。就以「漢學—訓詁」和「宋學—義理」這組對立為例，錢泰吉（1791—1863）有這樣的觀察：

而說經之士往往分門漢宋，辨論嘵嘵，講宋學者，以漢儒為破碎大道、尋求訓詁之末務；述漢學者，以宋儒為拘牽文義、摭拾心性之迂談。<sup>53</sup>

又如陸以湑（1802—1865）：

漢學精於訓詁……宋學深於義理。<sup>54</sup>

羅汝懷（1804—1880）對時風的描述同可證明：

今人所視為漢學者，名物、度數、訓詁也；所視為宋學者，義理也。<sup>55</sup>

邵懿辰（1810—1861）：

<sup>53</sup> [清]錢泰吉：〈石門縣重建傳貽書院記〉，《甘泉鄉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緒十一年增修本影印，冊1519），卷14，頁416上。

<sup>54</sup> [清]陸以湑：〈志學箴〉，《冷廬雜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咸豐六年刻本影印，冊1140），卷8，頁636下。

<sup>55</sup> [清]羅汝懷：〈與曾侍郎書〉，《綠漪草堂集》（清光緒九年羅式常刻本），文集，卷21。



夫漢學長於考訂，宋學長於義理，固不可疇爲輕重。<sup>56</sup>

方濬頤（1815—1888）亦曰：

窮經者何？訓詁之學也，漢學也。講道者何？義理之學也，宋學也。<sup>57</sup>

清末鄧實（1877—1951）也如此表示：

乾、嘉之世，考據之風盛行，學者治經，以實事求是爲鵠，鑽研訓詁，謹守家法，是曰漢學。方、姚之徒治古文辭，自謂因文見道，尸程、朱之傳，是曰宋學。<sup>58</sup>

「漢學重訓詁而宋學講義理」透過論述的反覆生產，於焉定調，直到現在，不少重要的經學教本中，仍持「清代漢學重訓詁考據而瑣碎、少義理創見」或暗示漢學家乃「為考據而考據」的論調，<sup>59</sup>但正如江藩「納宋入漢」之舉所暗示的，漢學家顯然不認為自己「輕義理」。<sup>60</sup>可根據以上引文，除了批評漢學及立場不明顯者，或連部分與漢學淵源頗深的學人（包含與江藩同時代的阮元、紀昀等人），都參與了「漢學重訓詁而宋學講義理」這個認識的傳播與再生產。那麼，這樣的認識如何透過「宋學」及「漢宋對立論」被創造，又為什麼而被創造呢？

<sup>56</sup> [清]邵懿辰：〈儀宋堂後記〉，《半巖廬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四年邵章等刻本影印，冊1536），遺文，頁602上。

<sup>57</sup> [清]方濬頤：〈學論〉，《二知軒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刻本影印，冊1556），卷1，頁316上。

<sup>58</sup> [清]鄧實：〈國學今論〉，《國粹學報》，光緒41年4月。

<sup>59</sup>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第20節；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合著：《經學通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8月），頁610。

<sup>60</sup> 漢學家所謂「義理」與當時主流的、理學的「義理」或有出入，但漢學家鑽研經學的目的，絕不僅止於辨明訓詁而已。惠棟曾言：「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九經古義述首〉），又如戴震：「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此誠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凭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惟空凭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惠、戴二位漢學泰斗之言，足證以「重視義理與否」分判漢宋的偏頗。又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自序》所言：「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現，道在其中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光緒劉氏刻聚學軒叢書本影印，冊452，頁138上）漢學家對義理的關切，可參張素卿先生《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臺北：里仁書局，2007年）中的諸多討論。

不以漢學本位出發的士子，或者身在官場的學人（如阮元），操作著與江藩相同的語彙和結構，但論述方式和企圖卻如雲泥。「宋學」在論述結構中被抬升至與「漢學」相當的位置，原本「僅存的優點」成為「（與漢學相較之下）突出的特長」：於是，「宋學重 OO」的說法，同時也悄然完成了漢學「輕 OO」的論式。以前例而言，批評者乃透過宋學「重義理」的主張，建構漢學「輕義理」的特徵，最關鍵的轉出，在於漢學「輕義理」的缺陷一旦被確定，宋學「重義理」作為對治，便不可或缺，如此逆解了漢學收編宋學的企圖——此以宋「為度」的知識效應「維度」，正是本文聚焦之處。

逐漸熱門的「宋學」一詞與「漢學」複雜的互動，在以上回顧中表露無遺。我們不妨更激進地指出，當漢宋對立被如此操作以後，宋學的內涵其實全然任意，無論「宋學」怎樣界定，總之永遠指向「漢學」的匱缺，當人們「需要」漢學「缺少什麼」，宋學「便是什麼」。這也側面解釋了「宋學」意義多樣性與不穩定性的原因：這些繁複、看似無關有時甚至彼此矛盾的所指，實則圍繞著同樣的目的被生產。引而申之，恐怕也暗示了描述宋學「本體」之不可能。

## （二）帝國、官學、漢學：歷史化「宋學論述」<sup>61</sup>

至此，我們必須提出一個關鍵的問題：清代士子以漢宋對立的論述裝置削弱漢學，是在回應什麼樣的歷史情境？要釐清這個問題，有必要將帝國官方的存在納入考慮。

許多關於漢宋之爭的研究，往往給人「漢學家出於抑宋揚漢的目的，確立宋學並倡導漢宋對立」的印象（前文提及林保全的學位論文，即是一例），但從現存文獻來看，學界公認的幾位重要漢學家，對宋學的討論乃至漢宋高下的分判，都是比較被動的。第一個提出「漢學」的惠棟，傳世著作中未曾談及一個對立於漢學的「宋學」；<sup>62</sup>戴震、凌廷堪面對當時初露苗頭的、以漢為訓詁而以宋為義理的漢宋分歧，表現出明確的批判態度；江藩以兩部學術史專著，試圖緩和甚囂塵上的漢宋之爭；胡承珙以為訓詁、義理相資而不可偏廢，實無「漢詳於訓詁、宋晰於義理」之謂；在漢宋之分幾成定論、更加勢同水火的晚清，陳澧（1810—1882）卻打出了漢宋兼採的旗幟。<sup>63</sup>

具代表性的漢學家們其實並不熱衷於強調漢學與所謂「宋學」的高下，若他們本身對此也頗為保留，那傳播且激化「抑宋揚漢的漢宋對立論」的動力何來？本文以為或是源於官方學人的揣度上意，輔以清廷方面的放任默許。

<sup>61</sup> 感謝評論人的提醒，建議在本節補入一手文獻以強化論證，然而楊念群在其書中已十分詳盡的進行過歷史文獻的回顧與政治情境的耙梳，相關討論讀者可參《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七、八章與結論，篇幅所限，在此茲不重述。

<sup>62</sup> 參註 33。

<sup>63</sup> 李柏緒：〈陳澧與漢宋調和〉，《開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05 年），頁 80-85。

前文已經提及，《四庫全書》對漢宋問題的看法，或不如江氏二書引發那麼廣泛的迴響，所持立場與企圖也不同於江藩，但它無疑是最早提出「漢宋問題」的著作之一，且更能夠表現朝廷的態度，為學界公認的「抑宋揚漢論」之代表。雖然刊行於乾隆年間的《四庫全書》在〈經部總敘〉中表示「學凡六變」，而「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sup>64</sup>可許多先行研究都已注意到其尊漢抑宋的傾向。<sup>65</sup>

在此我們將面對兩個問題。首先，明顯威脅了「官學」權威的漢學，何以在官方編纂的學術總集中被如此抬舉？<sup>66</sup>其次，貶抑「宋學」是《四庫》的終極目的嗎？或者《四庫》其實意在言外？

官學的核心實與學問無關，官學這個概念與各代據此架構的知識體系關鍵，毋寧說是權力：「官學」乃是決定「士林」這一知識菁英階層之權力結構並確保其再生產的機制。在具體的考試制度與試題內容分析以外，我們更應視「官學」為各種權力角逐的場所，在跨朝代的數百年演化之後，成了一個複雜的、自有傳統的主體，並不全為當權者的意志所貫徹，其中有天威莫測、有鴻儒典範、有萬千士子、更有在野學人。也就是說，官學與官方之間，存在著微妙張力，如何透過官學達成治理，需要掌權者細心的經營。

楊念群在《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

<sup>64</sup>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頁53-54。〈總敘〉以「宋學」為「精微／義理」的談法，常見於其後的清儒論述中。相關研究參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年）；張麗珠：〈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以《四庫提要》與《閱微草堂筆記》為觀察線索〉，《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53-276；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2期（2005年12月），頁83-128；林保全：〈「漢學」之形成與「宋學」之重構：南宋以降至清乾嘉之際學術史著作流變〉。

<sup>65</sup> 主編者之一的紀昀後來在〈丙辰會試錄序〉中為漢學與宋學粗分畛域：「至經義之中，又分二派。為漢儒之學者，沿溯六書，考求訓詁，使古義復明於後世，是一家也。為宋儒之學者，辨別精微，折衷同異，使六經微旨不淆亂於羣言，是又一家也。國家功令五經，傳註用宋學，而十三經註疏亦列學官，良以制藝主於明義理，固當以宋學為宗，而以漢學補苴其所遺，糾繩其太過耳。」亦是漢宋學系譜的早期重要論述，見清·紀昀：〈丙辰會試錄序〉，《紀文達公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嘉慶十七年紀樹馨刻本影印，冊1435），卷8，頁3387上。有學者據此〈序〉「以漢糾宋」的觀點，認為紀昀以漢學為輔助或次要，但本文寫於嘉慶元年，與四庫全書編成刊行的乾隆36年已頗有距離，乾嘉以降，漢學聲勢漸長，在科舉二、三場策論與經義考試中以「漢學式」博採群書、大量引用典故的方式作答，甚至成為一種時尚，面對不同的歷史情境，紀昀當有不同的思考與態度。詳參蔡長林：〈論常州學派的學術淵源——以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評論為起點〉，《中國文哲研究期刊》第二十八期（2006年），頁178的註釋18。

<sup>66</sup> 此外，如張循所言，除了《四庫全書》在編纂立場上頗傾漢學，對於講究博通群書以治經、依賴古籍以稽古的漢學進路而言，《四庫全書》的頒行本身，對漢學體系的建立與傳播，就提供了很大的助力。見張循：《道術將為天下裂：清中葉「漢宋之爭」的一個思想史研究·引言》。

中，對清帝與士人雙方關於道統及治統問題的觀念分歧，以及外族統治者重塑正統觀的努力有精彩的討論。清帝對於朱子的態度一直是曖昧的，一方面透過崇朱（以康熙最具代表性）承接「道統」，強化治統的穩定與正當性，一方面又忌諱「道統」傳承中士子與帝王共治天下的想像（向來被認為乾綱獨斷的乾隆帝即是一例），且朱子夷夏之辨的歷史觀念，更深刻威脅了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在兩種極端態度與目的之間，代表道統的朱學與當權者的關係一直擺盪不定，如不時能在乾隆諭旨中看到批評朱子的言論，可他又「有意甄別和竊取“道統”的內涵以為己用。」<sup>67</sup>

「正統」包含了道統與治統，前者的承續與否，是攸關後者的問題。正如楊念群的分析，治統可以由武力奪得，但道統的正當與否，一直掌握在士林手中，也即是說，奉朱子為道統的、具相對自主性的士林，是清朝繼承正統的不確定因素。此時「漢學」不但提供了一個門徑，使清朝能上接秦漢乃至三代的道統，成為正統系譜的成員，如阮元曰：「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sup>68</sup>且漢學家對南宋以降道統（朱學）的質疑，更擾亂了既存士林結構的穩定。對頭痛於道統問題的雍、乾二帝來說，漢學家非但並未冒犯皇家權威，甚至提供了改寫「道統／正統」的可能，朱維錚謂漢學家「罕有『經世致用』之意」，容或有待商榷，但他對於漢學興起造成的「正學」危機，卻有相當生動犀利的評論。<sup>69</sup>

《四庫全書》的論述，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中被提出，我們不妨藉以省視此書「抑宋揚漢」的論述目的。「抑宋揚漢」的描述，難免誤導人們分《四庫全書》之論為「抑宋」與「揚漢」兩概，但根據前文的分析，《四庫全書》事實上並不是「抑宋『並』揚漢」，而是「抑宋『以』揚漢」，意在擾動士林既有的權力結構。乾隆何以在四庫館中鼓勵樸學，甚至默許紀昀等人批評道學末流，在科舉考試中卻仍使用朱子學系統的經典詮釋，恐怕都由不得我們不再深想一層。

重點不在於《四庫全書》中的宋學「是什麼」，而是《四庫全書》運用漢宋對立的論述策略，以貶抑宋學襯托漢學，賦予漢學這新興的民間學派不下於官學

<sup>67</sup>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頁 393。朱維錚如此分析雍乾時期理學沒落的原因：「……雖然愛講『天道良心』，標榜『中庸之道』，卻比康熙帝更不喜歡道學家們的『講』。因為一講就會侵犯皇帝關於聖賢道理的解釋的壟斷地位。」（〔清〕江藩著，徐洪興編校：《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 12。）而張麗珠也指出，清朝所崇奉的理學，實是種被「實用化了」的理學，用以箝制臣民思想言行，見氏著：〈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以《四庫提要》與《閱微草堂筆記》為觀察線索〉，頁 255。

<sup>68</sup> 〔清〕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擘經室文集》，卷 2，頁 26。

<sup>69</sup> 朱維錚認為，漢學家解經考史的種種論著「分開來看無不支離破碎，合起來看則可說是此一拳，彼一腳，將五百年來高踞廟堂的『正學』，摧殘得百孔千瘡。危微精一，出自偽《書》；《大學》、《中庸》，原非孔學。講宋學而攻漢儒，乃屬數典忘祖；是程朱而非陸王，可謂同室操戈。」（〔清〕江藩著，徐洪興編校：《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頁 14。）

的正當性，引發士林內部資源重分配的焦慮。<sup>70</sup>楊念群指出漢學的風行不能只視為清儒畏懼文字獄而被迫發生的思想轉向，<sup>71</sup>更有朝廷的介入，讀來雖有些陰謀論的意味，然確非無據。<sup>72</sup>

承前述，無論是漢學家質疑程朱，以古義為準繩的主張，或帝國對「學術正統（亦即晉身士林之『入場券』）」的搖擺，都激起了既有官學體系擁護者的危機感，而透過改寫「漢宋對立論」中宋學的策略位置，他們於是可以轉化清廷「（抑宋揚漢的）漢宋對立論」，以之削弱甚至收編漢學，且藉「評述漢宋優劣」構造出一個超然的「外部」視角，論者本身於是能外於這組對立，而不成為被批評或質疑的標的。透過這一「論述——再現」，漢學對官學權威與當代學術論述的挑戰不但大為削弱，且成了對「宋學」而非「我」的挑戰，從而緩解了士子們的焦慮。

另一重要背景是，在一個時代中，「學者」總是極端的少數。錢泰吉所謂「分門漢宋，辨論嘖嘖」的「說經之士」，其實多屬「非經學專業」的普通士子。雖然我們難以透過具體的學術專著找到線索，但經由檢閱科考朱卷，可見其曖昧——或者說功利——態度之一斑，<sup>73</sup>學者也指出，當時存在著「不讀漢宋書，也爭漢宋學」的現象，<sup>74</sup>顯見「漢宋之爭」已從一個學術問題，轉為士人論學的風尚或談資。我們可以合理推測，漢學與宋學「各有所長」這種對於立場鮮明的學者們或有些「鄉愿」的評論之普遍化，他們應是重要的推手；另一方面，當漢宋辯論成為士子名流彰顯時髦的手段，這股思潮最終面貌的決定權，其實早已不為造詣高深的學者們所掌握了。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以上操作的後設性。人們對「宋學」乃至「漢宋對立」的運用，並不是建立於一個清楚先在的概念本體上，而是非常策略性、目的性的再現。這樣的論述方法，也使得人們在不同的脈絡下，發展出不同的宋學定義，產生不同的論述效應。

### （三）士林的回應：重詮「漢宋調和論」

綜觀清中葉至清季，漢宋之爭幾乎籠罩了整個士林，但也並非所有人都不亦樂乎地深陷其中。超越此二元操作的思考線索，正發酵於部分漢宋調和論者之

<sup>70</sup> 但這當然不代表了朝廷就認可了「漢學」，此操作是策略性的。參註 36。

<sup>71</sup> 持此論者，如章太炎：〈清儒〉第 12，《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冊 3，頁 155。

<sup>72</sup>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頁 393。另楊書並未明確區分「漢學」與「考據學」，而是做為同義詞交互使用。

<sup>73</sup> 張循以科考朱卷為材料，注意到乾嘉以後舉子在科考第一場「四書義」仍以宋儒經說為圭臬，但在科考二、三場「五經義」與「策論」部分則「泛引群書」的「漢學式」答題現象，惜其成因、意義與影響，目前仍未見深入討論。張循：《道術將為天下裂：清中葉「漢宋之爭」的一個思想史研究》，頁 36。

<sup>74</sup> 張循：《道術將為天下裂：清中葉「漢宋之爭」的一個思想史研究》，第一章。

間。

清廷一方面收編漢學的發展，獲取道統與治統的正當性，一方面仍以朱學為官學「羈縻」士林，<sup>75</sup>同時透過激化漢宋對立的論述分裂知識分子。我們尤可透過朝廷在《四庫全書》及種種學術散論中讚揚「漢學」，在科舉上又排擠「純漢學」的治學進路，導致專業漢學家往往仕途多舛、貧困以終的兩面手法中，看出清廷挑撥士林的企圖。一個以清帝為核心、收天下學者於掌上的設計，至此已經完成。楊念群如此分析：

清代帝王收「治統」與「道統」為一身，士林不但無法教化帝王，而且清朝君主自身已形成一系“帝王經學”，對儒家經典的理解也有自己的一套邏輯，一旦擁有此項功能，它就會緩慢卻堅韌地消解士林中對“道”的遵奉和理解。<sup>76</sup>

然而，楊念群未及處理的問題是，在複雜的歷史情境中，這分而治之的算計，又能否如此順利的永久運行？重省「調和漢宋」的呼聲，或將帶來一些不同的思考。

前一小節提到，焦慮於漢學崛起者透過宋學論述的效應，收編了漢學的挑戰。然而，這畢竟沒有真正回應朝廷分立漢宋以介入士林的企圖——那樣的改寫，仍肯定了「漢宋分別」的範疇。然而，清朝中晚期發生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漢／宋學」的再度改寫，「調和漢宋」的呼聲逐漸壯大，宋學開始可以不再是漢學永恆匱缺的對立指涉，或者漢學被稀釋後的部分，而這正是瓦解這組論述引發之爭議與對立的契機。<sup>77</sup>舉例言之，時代較早的焦循進一步顯題化江藩的觀點，明確將「義理」從「理學」的壟斷中解放，強調「漢學義理」的存在，從而取消「漢宋對立／互補」的論述基礎：

王惕甫《未定稿》，載上元戴衍善述戴東原臨終之言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因引以為排斥古學之證。江都焦循曰：非也。……則其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心』者，即東原自得之義理，

<sup>75</sup> 在清帝為尊的前提下，雖要「以漢（學）制漢（士林）」，盡可能挑撥士林內部，可這絕不表示清廷認可「漢學」主導經典詮釋，而勢必要使漢宋僵持，清廷方可坐收漁利。如清代仍以朱學為官學，但以漢學家的「學術成就」之故，破格晉用為四庫館臣；在官方纂輯或編寫的著作中，以調和為名目，實則力捧漢學而對宋學多有微詞……皆造就了清代漢學看似聲勢浩大，實則朝中無人的現象。

<sup>76</sup>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頁 396。

<sup>77</sup> 這波思潮之所以能夠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也在於嘉慶以後，帝國中央對從地方政治到學術思想各方面的控制逐漸有心無力，相對鬆弛。

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sup>78</sup>

或如謝章铤挪用江藩「漢學宋行」說，以「履踐」為宋學，且以此直接「通理」而為絕學，改寫了江藩所設定的漢學優先位置，同時突破宋學長期對舉於漢學的限定性：

顧余竊謂立品端方、踐履篤實即是宋學。天下之通理蓋即古今之絕學，非如窮經者必斤斤奉一先生之說也。

又如劉恭冕（1824—1883）試著提出新的學術判准以弭平門戶：

不謂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聖道、證明典禮，期於實事求是而已。<sup>79</sup>

以及晚清張之洞（1837—1909）視二者為「下學而上達」理想的兩端，必須同時達致：

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用漢學之師法，雖兼采諸儒之說，亦漢學也；守宋學之準繩，雖不談性理，亦宋學也。漢學師法，止於實事求是；宋學準繩，止於嚴辨義利，無深談也。<sup>80</sup>

都蘊含了有待後人仔細深究的學術史線索。另外，在「道統」這一層面上，值得注意的努力，在於漢宋合流的系譜重整（江藩的《師承記》與《淵源記》，不妨視為此說先聲），如朱一新（1846—1894）：

<sup>78</sup> [清]焦循：〈申戴〉，《雕菰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四年院福嶺南節署刻本影印，冊1489），卷7，頁168下。

<sup>79</sup> [清]劉恭冕：〈論語正義後序〉，《論語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同治刻本影印），頁289上。

<sup>80</sup> [清]張之洞：〈創建尊經書院記〉，《張文襄公古文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十七年刻張文襄公全集本影印，冊1561），卷2，頁408上。

且宋儒時以荒經爲戒，程朱言之尤力，讀宋儒書而不求之經義，亦無此讀書之法也。……近人束諸高閣，不知宋五子書布帛菽粟之文也。<sup>81</sup>

謝章铤此言更能顯現「連通漢宋」以重寫系譜的企圖：

或者曰：「書院之盛衰，不過利餐錢而來耳。今且高其名曰『漢學』。」嗟乎！學一也，如或所言，是殆以漢學爲粗，宋學爲精耶？不知精由粗生，無粗則無精，無漢學則亦無宋學矣。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博何以爲約？無文何以言禮也？<sup>82</sup>

當然，縱使這些論述都發生於清朝中晚期，學者彼此仍有活動時間、地域及說話情境的差別。他們的論述意圖為何，未必可知，然而這些脈絡各異的言說，卻也在在證明了「漢宋調和」或一種非對立性的漢宋閱讀框架，作為學術討論的共識與起點，已是當時常見的現象，而朝廷透過挑撥漢宋運作的治理模式，也不得不隨之變化。

據此，當可以進一步深化楊念群的分析：若視「道」為多重權力角逐、形塑的「真理論述」，則士林對道的遵奉與理解，絕不只是毫無招架之力地任帝王經學「消融」。各方互相涵攝、挪用乃至於改寫彼此的「宋學」乃至「漢／宋」論述，或是挑撥學人／士子、或是收編他者的批判、或是回應當權者分化士林的企圖，都是本文透過「再現——論述」重新討論「宋學」，希望揭示的、值得玩味的知識現象。

## 五、結語

近年漸有學者深入反思「漢宋對立」的清代學術史框架，如曹美秀〈趙翼的古文《尚書》觀點——以漢、宋學為核心問題的個案研究〉、<sup>83</sup>〈漢、宋學問題之再思考——以翁方綱為例〉（研討會初稿，未發表），重新回到清儒各自的脈絡，

<sup>81</sup> [清]朱一新：〈問：「訓俗遺規，言甚切實，因思宋儒書甚有益於身心，但不求之經義，則是祀其宗而祧其祖，毋乃太陋與？」〉，《無邪堂答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廣雅書局刻本影印，冊1164），卷4，頁551下。

<sup>82</sup> [清]謝章铤：〈致用書院文集序〉，《賭棋山莊所著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影印，冊1545），文又續集卷2，頁423上。另「宋學源出漢學」的論述在《四庫全書》中已經出現，詳參林保全：《「漢學」之形成與「宋學」之重構：南宋以降至清乾嘉之際學術史著作流變》第五章之一、二節。

<sup>83</sup> 曹美秀：〈趙翼的古文《尚書》觀點——以漢、宋學為核心問題的個案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7期（2017年8月），頁1-42。



挑戰「漢宋對立」的認識。後人往往以趙翼（1727—1814）和翁方綱擅長考據方法，理所當然歸二者於密切相關訓詁名物的「漢學」陣營，可細查他們的著作及論述，與所謂典型「漢學」之間，依違頗多，<sup>84</sup>這正說明了「漢宋對立」的後設理解，<sup>85</sup>如何改寫、化約了學術史上糾纏曖昧的皺褶。<sup>86</sup>

〈以宋為度／維度——從清代宋學「再現」到漢宋論述〉正應被置於同樣的脈絡閱讀。本文的目的不在駁正前人「分類不精」，或者追問宋學的範疇、漢宋的界線乃至於個別學者的「正確陣營」，而是意圖以「宋學」之「論述——再現」作為切口，脈絡化這些「差異再現」的發生。一是期望補充學界目前相對欠缺的「宋學」研究與研究方法，二是在清代經學史的發展上，宋學再現的複雜多元，對整體知識現象的勾勒而言，確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述，「宋學」乃至「漢宋對立」至少被以數種不同的方法，為了不同的目的再現與運用：意欲緩和對立的江藩，透過納宋入漢的系譜重寫，回應甚囂塵上的漢宋紛爭；企圖分裂翰林的朝廷，藉此挑撥士子，維護帝王權威不墜；焦慮於漢學崛起者，則以之收編漢學；以「帝國／士林」的角度觀之，在官方算計中似無路可逃的儒生，也同樣透過論述的改寫，對抗帝王經學的鯨吞。

當然，宋學論述琳瑯滿目的歷史變化，也必須結合漢學的發展動態來分析，不同的情境條件，賦予了其時宋學論述不同的現身可能，因此本文雖以宋學的再現問題為討論核心，考慮到宋學再現與漢宋論述結構的緊密聯繫，本文往往是在漢宋論述的結構內討論宋學，並兼及學術與政治糾纏的線索。

知識現象在發生的當下，總是有機的組合，卻往往在後來者的回望中被予以常態化。透過「論述——再現」的取徑探討宋學論述，本研究期能對清代宋學與經學史領域，發揮少許補苴罅漏的作用。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sup>84</sup> 以趙翼而言，一方面擅長考史方法、反對理學「理在氣先」的觀念，卻又堅信古文《尚書》為真（一般認為漢學家為了解消宋明理學的立論基礎，往往傾向支持偽古文說）；而翁方綱對通常歸屬「考據」一門的金石學有極高造詣，於禮學及經學又深有心得，可不但對當時方興未艾的漢學、考據風氣多有貶詞，更極為崇奉程朱之學。

<sup>85</sup> 如張循以程晉芳為例，反省漆永祥《江藩〈漢學師承記〉研究》中，以為江氏「未曾見過程氏著述」因而「誤收」程氏入漢學系譜之說法，乃漆氏未進入「清人的漢宋語境」，故不能理解江藩的分判標準。但這樣的批評，亦假定了「清人」漢宋語境的一致性，參考本文以「論述——再現」為進路的史料爬梳，或可再深究。見氏著：〈清代漢、宋研究中若干問題的反思〉，頁47。

<sup>86</sup> 以此觀之，余英時頗富歷史決定論色彩的「內在理路」說，以「道問學」與「尊德行」兩大傳統之爭解釋清代經學發展，將「歷史」解釋為連續、承繼的必然，未免輕忽了學術發展面臨的種種歷史條件（即其所謂「外緣」條件）。參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二文的推論，《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年4月）。

- 〔清〕方東樹：《漢學商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刻本影印。
- 〔清〕方濬頤：《二知軒文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刻本影印，冊1556。
-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光緒劉氏刻聚學軒叢書本影印，冊452。
-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年。
-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59年。
- 〔清〕朱一新：《無邪堂答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一年廣雅書局刻本影印，冊1164。
- 〔清〕江藩著，徐洪興編校：《國朝漢學師承記（外二種）》，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7月。
- 〔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 〔清〕阮元：《學經室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5月。
- 〔清〕周廣業：《過夏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北京圖書館藏清種松書塾抄本影印，冊1154。
- 〔清〕邵懿辰：《半巖廬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四年邵章等刻本影印，冊1536。
- 〔清〕紀昀：《紀文達公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嘉慶十七年紀樹馨刻本影印，冊1435。
- 〔清〕紀昀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清〕胡承珙：《求是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影印，冊1500。
- 〔清〕翁方綱：《復初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李彥章校刻本影印，冊1455。
- 〔清〕袁枚，王英志校點：《袁枚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清〕張之洞：《張文襄公古文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民國十七年刻張文襄公全集本影印，冊1561。
- 〔清〕張鑑：《冬青館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民國四年劉氏嘉業堂刻吳興叢書本影印，冊1492。
- 〔清〕凌廷堪著，王文錦點校：《校禮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2月。
- 〔清〕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清〕陳壽祺：《左海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本影印，冊 1496。

〔清〕陸以湑：《冷廬雜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咸豐六年刻本影印，冊 1140。

〔清〕惠棟：《九曜齋筆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民 59，聚學軒叢書據清光緒中貴池劉氏刊本影印。

〔清〕惠棟：《松崖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清光緒劉氏刻聚學軒叢書本影印，冊 1427。

〔清〕焦循：《雕菰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四年院福嶺南節署刻本影印，冊 1489。

〔清〕黃宗羲：《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5 月。

〔清〕黃承吉：《字詁義府合按》，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清〕劉恭冕：《論語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同治刻本影印，冊 156。

〔清〕鄧實：〈國學今論〉，《國粹學報》，光緒 41 年 4 月。

〔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緒十一年增修本影印，冊 1519。

〔清〕戴震著，湯志鈞點校：《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清〕謝章铤：《賭棋山莊所著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光緒刻本影印，冊 1545。

〔清〕羅汝懷：《綠漪草堂集》（清光緒九年羅式常刻本）。

〔清〕顧廣圻：《思適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九年徐渭仁刻本影印，冊 1491。

## （二）近人論著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年。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年 4 月）。

李柏緒：〈陳澧與漢宋調和〉，《開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05 年），頁 80—85。

林保全：《「漢學」之形成與「宋學」之重構：南宋以降至清乾嘉之際學術史著作流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年 5 月。

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第 23 卷第 2 期（2005 年 12 月），頁 83—128。

張素卿：《清代漢學與左傳學——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臺北：里仁書

- 局，2007年。
- 張循：〈清代漢、宋學關係研究中若干問題的反思〉，《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7年），頁43—53。
- 張循：〈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頁49—96。
- 張循：《道術將為天下裂：清中葉「漢宋之爭」的一個思想史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7月。
- 張維屏：《紀昀與乾嘉學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年）。
- 張麗珠：〈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以《四庫提要》與《閱微草堂筆記》為觀察線索〉，《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53—276。
- 張濤：〈論惠士奇之禮學與乾隆初年漢宋學態勢〉，《臺大文史哲學報》預刊文章（2019年5月），頁1—38。
- 曹美秀：〈晚清漢、宋學視野中的朱子——以陳澧與朱次琦為例〉，《成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10年12月），頁159—188。
- 曹美秀：〈趙翼的古文《尚書》觀點——以漢、宋學為核心問題的個案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7期（2017年8月），頁1—42。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 陳摯：《漢學家眼中的宋學——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述論》，湖北：湖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3月。
- 崔發展：〈「宋學」在乾嘉漢學話語中的不同意蘊〉，《哲學與文化》第45卷4期（2018年4月），頁131—143。
- 彭衛民：〈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清代「漢宋之爭」的內在理路〉，《史學匯刊》第25期（2010年6月），頁69—103。
-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7月。
- 葉國良、夏長樸、李隆獻：《經學通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8月。
- 詹宜穎：《陳澧漢宋調和論——經義的追求與回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 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 蔡長林：〈論常州學派的學術淵源——以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評論為起點〉，《中國文哲研究期刊》第28期（2006年），頁171—215。
-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魏永生：《清中晚期漢宋學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近代文化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